



馬克思 恩格斯

論 殖 民 主 義

200

A13

20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 恩格斯

論 殖 民 主 义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二 年 · 北 京

馬克思 恩格斯
論 殖 民 主 義
易廷鎮等譯校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 號
五三五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14 $\frac{3}{8}$ · 插頁 2 · 字數 345,000

1962 年 7 月第 1 版
196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20,500 定價 (五) 1.40 元
統一書號 1001·520

俄文本序言

本文集收入了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述、手稿材料和书信，它們闡明了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殖民問題的立場。

現在，正当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潰业已成为当代的意义深远和极其重要的历史現象之一的时候，为帝国主义列强对經濟不发达和落后国家的殖民統治进行辯护的資产階級宣傳也特別活跃。資产階級的殖民主义政論家和思想家狂热地为奴役被奴役人民寻求辯解的途徑。他們力图证明西方列强在对待东方国家的关系上具有“文明傳播者”的“使命”；同时还竭力掩飾帝国主义除了保存殖民統治的旧形式外所不得不使用的更为巧妙的新形式，以便繼續剝削殖民地和附屬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那些揭穿資产階級国家殖民政策掠夺本质的著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被压迫民族只有为求得完全的民族独立而斗争才有可能保证其社会和經濟的解放和发展的思想，无产阶级导师关于殖民体系必然崩潰的闡述，就具有特別的政治意义和迫切性。

本书所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是和殖民奴隶制度进行彻底的不調和斗争的光輝范例；这些著述在工人階級和殖民地附屬国家人民的手里，是反对现代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政論家、思想家和辯护人的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民族-殖民地問題看成是无产階級革命学說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证明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廢除只有作为資本主义被消灭和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結果才可能实现。因此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最初开始从事科学研究和社会-政治活动的时候，資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就引起了他們的注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写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早期著作中就已經論及这些問題。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們就对殖民制度的发生及其在資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統的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对殖民地和附屬国家人民的历史命运表现了深刻的关注。他們研究了与他們同时代的这些国家的情况，考察它們被侵略的历史，它們受压迫的方式和方法，无情地揭穿了欧洲殖民强国的掠夺政策，深刻而全面地熟悉了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所有这些問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政論文章中以及在他們的大部头著述、各种手稿材料和通信中都得到广泛的反映。

本文集刊載了那些包含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資本主义殖民体系的最重要思想的著述。

在“德意志意識形态”这部两人合著的早期著述之一中，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一次以詳尽的形式表述了出来。随后在“共产党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确定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同殖民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彼此之間具有有机的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闡述了殖民制度产生的历史輪廓，着重指出了掠夺和剝削殖民地对于资产階級社会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他們指出：十五世紀末叶的地理大发现——美洲和环繞非洲去印度的航路的发现“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本书第1頁）。从这些国家輸出产品，特别是大量金銀的加入流通，对殖民地的質

易，交換工具在數量上的增加，——這一切在歐洲引起了工場手工業生產的空前高漲，給予商業和航海事業以巨大的刺激，並增強了正在成長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

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對殖民體系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意義和作用給予了最完整深刻的分析。

馬克思在這本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作中對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和發展的規律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得出一個結論：於十七世紀末形成的殖民體系是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重要杠桿之一。

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由於當時商業上的霸權確保了工業上的優越地位，殖民制度就已開始起着顯著的作用。按照馬克思的比喻的說法，殖民制度這個“異神”，“原來是和歐洲各個舊神，在祭壇上並占一席的，但它在一個好日子，一擊一蹴，把它們全打倒了。它宣布貨殖 (Plusmacherei) 是人類最後的唯一的目標。”(本書第 301 頁) 馬克思指出，殖民地為當時迅速茁長的工場手工業保證了銷售市場，而這種市場的獨占，又保證了不斷增加的積累。“在歐洲外部直接由劫掠，奴役，謀財害命等手段劫取到的財寶，都流回母國，在那裡轉化為資本。”(本書第 300 頁)

在本書所載的“資本論”第一卷第 24 章的摘錄里，馬克思描繪了一幅伴隨著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過程的兇凶極惡的暴行和殖民掠奪的最駭人聽聞的圖畫。他根據引自文件原文的大量事實，探溯了那些借助於武裝暴力強占殖民地的歐洲列強是如何無恥地和公開地掠奪和盜竊殖民地人民積累起來的財寶和自然資源，如何耗竭它們的生產力和消滅土著居民。馬克思寫道：“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被剿滅，被奴隸化，被埋於礦坑，正在開始的東印度的征服與劫掠，非洲被轉化為商業性黑人獵奪場所，都表示了資

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牧歌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要素。”（本书第 297 頁）他指出：在殖民制度最先得到充分发展的地方——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土著被盗窃出来去补充奴隶队伍；在美洲的英国殖民地，为剥印第安人——男子、妇女和小孩的——的头盖悬了赏格；在生活必需品的壟断貿易上公开欺騙印度居民，这使得英国殖民者“比炼金术士还要巧妙的从无生金”；而原始积累是“在不垫支一个銅板的情形下进行”（本书第 299 頁）的；在种植园上残酷地虐待土著；背信棄义、賄賂和杀人——这就是在原始积累时期殖民統治的若干最突出的表现。新生的“資本”他写道，“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髒的东西。”（本书第 308 頁）

馬克思进一步指出，資本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前提之一就是奴隶貿易。从非洲运出黑人奴隶去供应西印度群島的、美洲的及其他地方的种植园，就成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这些殖民列强发财致富的图利事业之一。从这个贩卖“人肉人血”的丑恶貿易中最发财的是資本主义的英国。英国在十八世紀初成了供給“新世界”的棉花种植园及其他种植园以奴隶的主要供应者。馬克思指出，英国的新工业有两个相同的奇異的樞紐——作为爱尔兰和大部分英国工人階級的唯一食物的馬鈴薯和在“美国用奴隶种植的棉花”（本书第 275 頁）。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英国資本主义工业就是这样依靠着双重的奴隶制度，——在英国的隱蔽的白人奴隶制和在大西洋彼岸的直接的黑人奴隶制。（同上頁）

在本书所收入的一系列著述中，无产階級的偉大領袖无可辯駁地证明：构成資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特征的殖民統治的那些粗

暴的种族主义方式和方法，在他当代——即在資本主义的整个壟断前时期中，始終是占着优势地位的方式和方法。大家知道，在种种殖民政策的旧方法中，有許多就是到今天还被帝国主义国家广泛地使用着。

百年以前，那些預料到現代殖民者策略的欧洲資产者，就曾竭尽一切力量，为自己对个别国家和整个大陆的侵占和奴役辯护，儼然欧洲列强对所謂落后的“野蛮”民族負有“文明傳播者的使命”。和他們当今的后輩一样，前一世紀的殖民者就曾高声宣称，似乎这个“文明傳播的使命”目的在于“帮助”落后国家，整頓他們的“秩序”，在他們的人民中間傳播基督教以及“更高的”西方文化的原則。

在撕去資本主义掠夺者的“文明傳播者”的假面具、无情地揭穿他們掠夺計劃的本来面目时，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爱尔兰、印度、中国以及許多其他殖民地和附屬国家为例，得出結論說，軍事掠夺、捐稅和土地的掠夺，領土的兼并，賄买封建貴族和僧侶，橫蛮地破坏各种条約所規定的义务以至直接使用暴力，在十九世紀也是欧洲列强殖民政策的主要方法。馬克思写道：“只要把目光从資产階級的故乡轉向殖民地，資产階級文明的深深的伪善和它所固有的野蛮就毫无掩飾地摆在我們面前，因为在故乡它还装出一副假裝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赤裸裸地出現了。”（本书第80頁）

如果說，在原始积累过程中，殖民地剝削的基本形式是：以單純的占領“权”为基础的公开掠夺它們的天然富源，并且这时起着主要作用的是从殖民地向宗主国的产品輸入；那末，从十七世紀中叶起到十八世紀末叶一直延續着的这一时期，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費者”。（本书第1頁）

在這一時期，宗主國對外貿易所起的作用加強了。在十九世紀，即工業資本主義時期，和殖民地進行對外貿易就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殖民地愈來愈卷入世界市場的範圍，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不可缺少的一環。殖民地的經濟越來越適合於宗主國的經濟。這一時期，殖民地剝削的基本形式已轉變為從宗主國向殖民地的商品輸出。殖民地開始起着這樣的作用：作為宗主國的銷售市場、農業原料的附屬地和糧食的供應者，以及輕工業的原料供應者。馬克思指出，“例如東印度現在就成為了英國出產棉花，羊毛，亞麻，黃麻，藍靛的地方。”（本書第 276—277 頁）愛爾蘭這個被英國資本主義轉變為英國的“牧羊場與放牧場”的國家，也起着同樣的農業原料附屬地的作用。馬克思寫道：“……愛爾蘭今日還不過是……英格蘭的農業區域。它對英格蘭供給谷物，羊毛，家畜，並供給產業上和軍事上的新兵。”（本書第 284 頁）

馬克思主義奠基人在其關於殖民制度的論述中把揭發批判的主要火力指向英國這個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個他們當代資本主義世界中最強大的殖民掠奪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英國作為最大的海軍強國並且在商業和工業生產上占有優勢，它在地理大發現以後歐洲國家之間開始的為爭奪殖民地而進行的長期殘酷鬥爭中獲得了勝利。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指出英國的特征是一個擁有“最大的殖民威力的”國家。弗·伊·列寧在進一步發展這一思想時寫道：“……但是從十九世紀中葉起，英國至少就具備了帝國主義的兩大特征：（1）擁有極廣大的殖民地；（2）擁有壟斷利潤（因為它在世界市場上占壟斷地位）。”（見“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 23 卷第 110 頁）

本书所輯录的很大一部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是針對英国侵略者在爱尔兰、印度和其他英国殖民地的掠夺性殖民政策，針對英国資本家对阿富汗、波斯、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擴張計劃而写的。

这些著作的大部分篇幅是用于論述爱尔兰問題，論述爱尔兰这个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見本书第 340 頁)，这个“英国大地主制度的主要堡垒”(第 320 頁)。馬克思和恩格斯断定：早在十九世紀中叶，在这里就广泛盛行“清理”地产的方法，所采取的形式是将数以万計的佃农从他們的耕地强制驅除出去，而这些土地就被英国的大地主轉变为牧场。恩格斯根据对爱尔兰历史所作的深刻研究，得出結論說：进行侵略战争，用镇压和行贿的方法进行系統的压迫，最后，加上饥饉、移民和“清理地产”的共同作用，终于使这个国家破产，使爱尔兰人淪为极其貧穷的民族。英国統治階級在爱尔兰統治了几个世紀的結果，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英国已經毀坏了爱尔兰社会的生活条件。馬克思写道：“首先它把土地沒收了，然后它用‘国会法令’把工业压抑下去，最后又用武装力量去摧毁爱尔兰人民的积极精神。就是这样，英国創造了那样一些可恶的‘社会条件’，使得一个由貪婪的小貴族們組成的小卡司特 (caste) 能够任意作出决定：爱尔兰人民在什么条件下被允許使用土地并在这些土地上生活。”(本书第 48—49 頁)

按照馬克思的比喻的說法，英国人将印度也“爱尔兰化”了。

英国奉行“分而治之”的原則，广泛使用行贿、阴谋、欺騙和直接暴力的方法；到了十九世紀中叶就已完成对这个广大富饒国家的征服。印度成为英国資產階級发财致富的最大源泉，这些資產階級“在單純的賄賂不能滿足他們的貪欲的时候”，就采取“凶惡的

勒索手段”。(本书第 80 頁)

英国侵略者漸次破坏千百万印度人民的傳統生活条件。在本书所載論印度的論文和书信中，已描繪出一幅英国殖民者任意宰割掠夺这个国家的图画。馬克思指出：英国人由于忽略东方国家生活上如此重要的部分，即忽略了組織同設立和維持人工灌溉制度有关的公共工程机构，这就造成了农业的衰落。他們以自己較廉价的棉織品輸入印度来破坏印度社会結構的基础——手織机和手紡車，从而就使得数以百万計的印度紡工和織工瀕于死亡。英国殖民者既破坏了从远古时起就一直存在的农业公社这种特殊的社会制度，这种奠基“在手織业、手纺业和用手耕作的农业的特殊結合上的”(本书第 30 頁)社会制度，就切断了在印度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之間的由来已久的傳統联系。因此他們就給予印度社会以最后的打击。这样一来，英国侵略者就破坏了印度的文明，“把印度社会的整个机构摧毁了，至今还没有加以重建的征兆。”(本书第 26 頁)

馬克思指出，英国人在印度的长期統治使构成这个国家居民的絕大多数的农民，遭受完全破产和貧困化。英国当局用实施两种土地稅收制度——在孟加拉的柴明达里 (zemindari) 制和馬德拉斯及孟买的賴奧特华里 (ryotwari) 制——使印度的賴奧特 (ryot) 农民遭受到土著封建主和殖民地国家的双重压迫。馬克思在揭露这些制度的內在矛盾性质时写道：“这样一来，我們在孟加拉就有这样一种組合物：英国的地主制度，爱尔兰的中間人制度，把地主变成为征稅人的奥地利制度和国家是真正的地主的亚細亚制度。在馬德拉斯和孟买，我們有一种法国式的农民土地所有人，他們一方面是农奴，同时又是国家的对分佃农 (métayer)。所

有上述各种不同制度的弊端都积累起来，重重地落在印度农民的头上，而这些制度所具有的一些可取之处，他却一点也享受不到。”（本书第 72 頁）由于实行这些制度所規定的令人担負不起的重稅，以及印度农民的无力繳付，就引起在征稅上普遍使用拷打的办法，这种办法在印度业已成为“英国財政政策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根据馬克思的估計，英国人每年通过地租、铁路股息、軍政公務人員的年金、战争費用等等方式，从印度人那里刮取的、“沒有用任何等价物去償付”的价值，不包括他們每年从印度掠夺和印度人每年必須发送到英国的那些无偿商品的价值——其总值比印度的六千万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所得总和还要多。馬克思在其 1881 年 2 月 19 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憤慨地写道：“这是一种放血过程，一种令人憤恨的事情！”

欧洲列强在十九世紀彼此为了爭夺新的銷售市場，爭夺亚洲非洲尚未被占的領土而进行殘酷的斗争；到了該世紀的末叶，又为了重分若干旧殖民地而进行殘酷的斗争。十九世紀中叶的殖民擴張（其中英国扮演着最积极的角色），主要是向中亚細亚和远东的国家进行的，从該世紀的最后 $\frac{1}{3}$ 時間起，則基本上是伸向非洲大陆的腹地。在这一期間，除了老殖民强国——英国、法国等等——搶夺未瓜分的殖民地和重分旧殖民地的还有新的殖民竞争对手——德国、日本和美国。

在本书所載的論阿富汗，論波斯和論中国的論文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揭穿了英国資本家所从不放松地反复进行的企图：在这些国家中确立自己的統治，像当时他們奴役印度人民那样去奴役它們的人民。

馬克思在論述 1838—1842 年第一次英阿（阿富汗）战争的事

件時曾寫道：英國力圖獨吞整個阿富汗，但却在保護阿富汗人使不受波斯人侵害這個虛偽借口之下發動戰爭，雖然自己“永遠和他們有不共戴天之仇”。（本書第 83 頁）恩格斯認為英國人在這次戰爭中遭到慘敗的原因之一正是在於：“到了這個時候，在阿富汗人中間對不列顛統治所懷有的仇恨已達到頂點。”（本書第 158 頁）

英國在保護阿富汗人的同樣的虛假借口之下發動了 1856—1857 年的對波斯戰爭，而它的真正意圖則在於實現夢寐以求的侵佔波斯領土的宿願（見本書第 82 頁）。馬克思指出，英國人利用存在於波斯和阿富汗民族之間的政治的、民族的、部族的以及宗教上的矛盾，來達到自己自私自利的目的。它不僅挑撥這兩個民族互相敵視，並且設法造成這樣的印象：好像它是他們的天然的同盟者，同時還唆使兩個民族對它們的鄰近國家採取敵對行動。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些論文中，尖銳地批判了英國在亞洲的外交的背信棄義性質及冒險家行徑，這種外交在英國資產階級的手中始終是推行殖民政策的積極工具。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英國在外交上敢於採取任何一種冒險行動，从不規避最卑鄙的手段和方法，為了自己的利益，在東方統治者的朝廷中廣泛使用陰謀詭計，經常行賄、欺騙、訛詐和挑撥離間，不惜組織陰謀和暗殺，以實現自己的侵略計劃。

馬克思揭露出英國在亞洲外交上所慣用的手段之一，就是為英國外交代表所廣泛使用的這種發動武裝侵略的借口：與地方當局挑起衝突，然後責難後者破壞現存的——並且往往是臆造的條約。馬克思在分析對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原因和進程時，就嚴斥英國殖民者的無恥偽善行為，斥責他們利用無足輕重的借口，來責難中國當局違反外交禮節，然而他們自己卻粗暴地破壞國際法

的基本原則，不經預先通知即行開戰，對廣州的和平居民進行殘酷的炮轟。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中國這個在十九世紀曾是歐洲列強（主要是英國）殖民擴張主要對象的國家為例，指出英國資產階級為了貪得無厭地追逐利潤，如何不惜利用最卑鄙發財致富的源泉。在一個很長的期間，這種來源之一就是對華鴉片貿易，這個貿易的壟斷權集中於英國東印度公司之手。

英國從十八世紀末葉起就已大量增加向中國輸入鴉片。在十九世紀的整個上半世紀，向中國輸入這種麻醉劑已成為英國的重要出口項目。中國政府嚴禁鴉片輸入，鴉片貿易使這個國家的銀兩外溢，耗竭其生產者的生產力量。英國殖民者對於中國政府堅決反抗的答复是通過賄賂中華帝國的官吏，使這種走私貿易活躍起來。馬克思斷定，“戴着基督教假面具的、自誇文明的英國政府”在印度的收入，實際上不只依賴於“對華的鴉片貿易，而且還依賴於這個貿易的偷運性質”（本書第242頁）。鴉片貿易給英國資本家帶來了神話般的利潤，並且根據馬克思的計算，它構成英國當局在印度收入的七分之一。馬克思揭穿英國人為了擴大這種貿易而發動的所謂“鴉片”戰爭的掠奪性質時，曾諷刺地寫道：“……慣於以自己的高尚道德標準而自誇的約翰牛，却寧願以海盜式的借口時常向中國勒索軍事賠款，用來彌補其貿易逆差”（本書第248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深切的關注和熱烈的同情來對待十九世紀中葉在殖民地和附屬國家，特別是印度和中國，日益發展起來的民族解放運動。

無產階級的領袖在研究被壓迫民族為反對殖民枷鎖而進行的鬥爭時，提出了許多關於歐洲的革命和東方的革命彼此相互依賴

的重要理論原理。他們把被奴役國家人民的運動看成是新的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的條件下能夠產生一種促使歐洲國家革命化的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民族解放運動看成是歐洲革命的同盟者，按照他們的意見，這個革命將要作為即將到來的世界經濟危機的一種後果而爆發。

因此，他們認為 1851—1864 年中國的強大的反封建農民運動（歷史上稱為太平天國起義）和 1857—1859 年印度的人民起義，具有重大的意義。馬克思說明太平天國起義是中國人民的一次“強大革命”。這次起義為清朝封建主的壓迫所激起，並為英國工業產品對中國的地方工業進行競爭的破壞性影響、鴉片走私進口的加劇、以及為了要償付結束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戰爭賠款引起增稅所推動。馬克思認為這次起義可能把西方革命事件的爆發時間提前。馬克思把這次革命事件和下面這些事情聯繫起來：起義引起銀幣從歐洲流入亞洲，縮小了中國市場，癱瘓了英國的對華輸出，從而在一定程度內促成了 1857—1858 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

印度民族起義的基本原因，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是長期殖民壓迫和殖民剝削的殘酷方法激起了印度社會各階層和各階級普遍憤恨。因為這次起義也對英國向印度的輸出產生消極的影響，而且把大部分武裝力量引離英國，因此馬克思把這次起義看成是在一定的情況下可能促成歐洲革命的因素之一。馬克思在其 1858 年 1 月 14 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說：“印度必然使英國花費人力和金錢流出的代價，現在是我們最好的同盟者。”（本書第 342—343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出被壓迫民族對歐洲列強的殖民政策的普遍憤恨正在不斷增長的同時，揭示出在不同的殖民地和附屬國

家的解放运动过程中各个个别阶段之间的彼此互相联系和互相依靠的性质。马克思写道：“……孟加拉军队的起义无疑是同对波斯和中国的战争紧密联系着的”，他所指的是这样的情况：当对波斯的战争把殖民地军队中的欧洲人部队从孟加拉管区刚刚抽调出去之后，印度的土著雇佣兵的起义就立即爆发了，而印度起义反过来又迫使英国当局不得不暂时中止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在分析英波战争的后果时，马克思着重指出，英国侵略者结果所得到的“纯利”就是：“大不列颠在整个中亚细亚给自己招来仇恨”（本书第13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书所载的许多论文中，愤怒地谴责了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殖民者残酷地迫害被奴役国家的人民的暴行。马克思和恩格斯揭发了欧洲侵略者在对待爱尔兰起义参加者，对待“鸦片”战争期间在被占领的中国领土上的和平居民，对待印度的起义者，对待牙买加岛上的起义黑奴，以及对待爱奥尼亚群岛、阿尔及利亚及其他殖民地和附属国家居民上所表现的残酷。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英国殖民地军队在印度起义期间的行径为例，表明殖民地军队的特征就是殖民政策的工具。恩格斯指出，英国军队在文明和人道的名义下向印度进军时，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伴随着掠夺和迫害，对起义者和手无寸铁的居民实行大规模的摧残，使被镇压的城市和居民点变为废墟。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文明传播者”对他们所侵占的殖民地居民犯下凶恶暴行最明显的证明之一就是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恩格斯在本书所载1857年写出的“阿尔及利亚”这篇论文里，阐述了个国家被侵略的长期历史，描绘了一幅法国侵略者在这个国家所建立起来的惊人残酷的殖民统治制度的图画。恩格斯着

重指出，从土耳其的枷鎖下解放出来又落到法国政权統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在这个所謂新統治的文明教化中絲毫沒有看出什么优点”（本书第 185 頁），从法国殖民者占領阿尔及利亚开始，这个国家就成为出現接連不断的杀戮、掠夺和暴行的場所。恩格斯写道：“阿拉伯人和卡比里人的部落像爱惜财宝似的珍視独立，把对外族統治的仇恨放在生命本身之上，他們被凶暴的侵襲所鎮压和平息，在被侵襲时，他們的住处和財物被焚毀，被破坏，他們的庄稼被踐踏，而幸存的不幸的人不是被屠杀就是受尽一切奸淫暴虐的蹂躪。”（本书第 184 頁）

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的辯護士們目前正在动員資產階級的一切宣傳工具，企图证明資本主义世界是唯一的“自由世界”，据說这个世界給所有一切人民带来了自由的原則。这是早在一百年前就已被殖民制度的辯護人所广泛使用的蠱惑人心的老伎倆。馬克思在揭穿英国資本家諸如此类的說法时写道：“按照約翰牛那些在印刷大厦廣場〔指“泰晤士报”——俄文本編者注〕的圣人們的說法，約翰牛之攫取殖民地仅仅是为了要用公众自由的原則去教育他們。可是如果我們求之于事实，那末爱奥尼亚群島也和印度及爱尔兰一样，只是证实了：为了国内的自由，約翰牛必須奴役国外。”（本书第 254 頁）

在現代殖民主义政論家和思想家为了保存帝国主义对經濟落后民族的統治而使用的許多虛偽借口中，被广泛利用的是这样一些神話：似乎这些民族在种族上和道德上是低劣的，它們沒有能力独立地去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务，因此必須有外来的“援助”和受外人的控制。

馬克思和恩格斯向諸如此类的种族主义“理論”进行了不調和